



\*

#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论析

汪 杰

(第三军医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重庆市 400038)

**摘 要:**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这个严重的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将直接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关重大。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最终化解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机,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卓越能力,表明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关键词:**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突发事件;中国共产党;能力

**中图分类号:**K26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3-0188-05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由于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江南的抗日武装而蓄意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因而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高度紧张,险些达到全面破裂乃至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程度。这个严重的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将直接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关重大,形势复杂,情况紧急。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最终化解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机,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卓越能力,表明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 一、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始终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高度进行理性思考,显示出我党在危机面前总揽全局的能力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和第一次反共高潮相比,这次反共浪潮不仅规模要大得多,而且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这一异常棘手的难题,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是极其严峻的考验。面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反共逆流活动,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懂得:

“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sup>[1]538</sup>,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坚决维护全国抗战大局。为此,我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始终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把握事态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既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和妥协投降作坚决的斗争,又将这一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从而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迫使蒋介石国民党始终不敢公开破裂统一战线。

国民党顽固派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皖南事变,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军事同盟。日本为了迅速从中国战场脱身以便腾出手来向英、美、法等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发动军事进攻,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而英美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一改抗战初期对中日战争的“中立”态度,积极援助中国,以便让中国拖住日本。英政府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用以运输援华军事物资;美国国会同意向蒋介石提供一亿美元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罗斯福公开声明:援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我不去做,就可能意味着远东爆发战争”<sup>[2]</sup>。苏联也极力拉拢蒋介石。对苏联而言,三国同盟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重大威胁。为确保东部地区安全,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苏联决定加大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力度,斯大林还亲自于10月

\* 收稿日期:2009-10-18

作者简介:汪杰(1965-),男,四川巴中人,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16日致电蒋介石，勉励其树立战胜日本信心。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国际局势的这一变动，两大集团的竞相争夺使蒋介石感到身价陡增，认为解决“共产党问题”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到了，因为这个时候“关起门来打内战，日本人会鼓励他，英美会不作声，苏联会不关心”<sup>[3]117</sup>。于是便有恃无恐地进行削弱打击共产党势力的布置。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授意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表了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战以来“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sup>[4]88-89</sup>，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由已有的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皓电”的发表，表明了国民党顽固派破裂国共关系的决心。如何处置“皓电”是中共中央应对危局的一个急迫问题：是拟就“炸弹宣言”，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还是适当做些让步，以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而又正确地回答这一严重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连续几次开会，研究应变措施，并与在重庆的周恩来、在苏北盐城的刘少奇、在晋东南麻田的彭德怀等人往返电商对策。经过认真讨论和反复研究，特别是从政治上权衡利弊后，中共中央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放弃了最初决定以强硬的“炸弹宣言”答复“皓电”的想法<sup>[3]105</sup>，于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白（即“佳电”），一方面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我党表示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但遗憾的是，我党顾全大局的让步政策并没有换来蒋介石国民党的真诚相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嚣张。1941年1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分三路纵队北上。1月6日，当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八万多伏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将士奋力自卫，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约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竟诬指新四军为“叛军”，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和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该怎么办呢？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行军事上的全面反

击，实施报复；另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如果选择前者，即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倒是痛快，也可以解人们的心头之恨，但那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破裂，必然导致内战的全面爆发，必然损害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在抗击日寇侵略、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时刻，如果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还能叫共产党吗？在如何对待皖南事变和国民党1·17命令的问题上，突出显示了中共领导人的理性思考。处于悲愤中的共产党人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忍受伤痛，以正确的政策代替义气和冲动，确立了在政治上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径进行坚决的全面反攻，而在军事上则实行防御的斗争方针。中共中央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sup>[1]771</sup>。皖南事变发生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开赴皖南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为死难者报仇雪恨。刘少奇告诉大家，目前反共高潮正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但是，又必须顾全大局，不能鲁莽行事。他说：“我们应牢记皖南事变血的教训”，“但不是急躁，而是沉着、坚定和勇敢，去进行我们目前所应进行的工作和斗争。”<sup>[5]</sup>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理智和极高的爱国情操动员党内外、国内外的力量，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以内战代替抗战、以分裂代替团结的阴谋，从而化解了危机，避免了内战悲剧的爆发。

## 二、处变不惊，冷静分析，正确把握事件的性质，显示出我党在危机面前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准确把握事件的性质是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的前提；善于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判定突发事件的背景和动因，科学地预测其发展方向，是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方能果断地制定正确的方针和应对措施。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认识，对国民党蒋介石是否投降日本和是否已下决心大规模反共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问题及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破坏团结抗日局面、阴谋消灭新四军的一个重要步骤，暴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分裂投

降的反动本质。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蒋介石集团并没有投降日本,仍保留在抗日的阵营里,对我党也不敢完全分裂。刘少奇是党内第一个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领导人。皖南事变发生后,身在华中前线的刘少奇冷静地分析全国的形势,敏锐地作出判断,1月15日,他向毛泽东等发了一封长电,提出了对时局的分析和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的建议。他在电报中分析说:“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因此,他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sup>[4]148-149</sup>。刘少奇的分析客观冷静,他的建议有利于防止事态扩大,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听取各方意见后,经过认真讨论,中共中央最终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

正当中国共产党尽心竭力挽救危局的时候,1941年1月下旬,日军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了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激战,国民党军遭受很大损失。河南战役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此次战役说明日蒋矛盾依然存在,也表明此前我党对蒋日关系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在应对皖南事变这一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我党及时地纠正了党内一些同志对形势的错误认识,统一了全党思想。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一些人感到,形势又将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将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完结了。的确,蒋介石国民党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近似于四一二政变,但这时有一个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毛泽东强调指出:“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sup>[1]781</sup>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同志把皖南事变估计为四一二事变,认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sup>[1]782</sup>。毛泽东还透彻地说,由于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对此,我党必须针锋相对,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就一天不改变这个政策。否则,我们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 三、从容应变,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争取最好的前途,显示出我党在危机面前力挽狂澜的能力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应对皖南事变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并不因为在政治上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尖锐对立的政策而胡干蛮干,而是自始至终讲究斗争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斗争,以达到孤立蒋介石,并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中止其反共行动的目的。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斗争策略非常正确,成效甚巨。胡乔木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评价,他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在策略上掌握得很好。加速了争取中间派向我党靠拢的进程,从此,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sup>[2]26</sup>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我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党在皖南事变前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佳电”),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普遍同情。

1940年10月19日,何、白“皓电”发表后,举国瞩目,中间势力尤为强烈地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当时,中间势力一方面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又担心抗日统一战线破裂,希望中共方面作出一些让步来缓和紧张的国共关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复以“佳电”,决定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全部北移。这是下了一着妙棋!它既可以使我党在政治上立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争取中间派人士的同情,孤立顽固派;又可以使皖南新四军脱离被顽军重兵包围的危险境地,完成重点发展皖东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佳电”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特别是在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毛泽东后来这样评价说:“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sup>[1]783</sup>

二是我党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提出解决善后的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也为全国人民所赞许。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国共关系由此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

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主要包括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等。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很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sup>[6]596</sup> 在我党猛烈的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很快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于是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要求与我党进行谈判。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你们关于蒋介石“如不实行十二条,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之方针是捉住江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死也不放,蒋把我们推到不能不和他对立的地位,我们领导的军队已经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他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我们没有和他谈的余地。”<sup>[4]193-194</sup> 刚愎自用的蒋介石怎么可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十二条呢?谈判只能告吹。

为了装饰门面以欺骗舆论,国民党当局决定利用3月1日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作为退兵之战。会议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指令张冲等人一定要设法争取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这届参政会。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不能无条件出席。2月10日,周恩来向各民主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左舜生、黄炎培等说明了中共不能无条件出席参政会的原因,并提醒他们不要上当。2月15日,毛泽东等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以前,“碍难出席”参政会。2月19日,周恩来将此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裁夺之前,中共七参政员不能出席参政会。3月1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满足“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但为了打破僵局,争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在参政会开幕第二天,中共中央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的“新十二条”,作为中共部分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基本条件。“新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等。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sup>[6]597-598</sup> 中共中央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获得了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势力的极大赞许。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气焰,“保证”以后决不再有

“剿共”的军事行动。会后又主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击退。

#### 四、揭露真相,引导舆论,争取国内国际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蒋介石国民党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显示出我党在危机面前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的能力

舆论导向,是话语权中最能改变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关键因素。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引导社会舆论,影响国际舆论。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蒋介石利用其掌握国家机器的地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造谣污蔑,进行欺骗宣传,同时又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愚弄公众。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尽一切所能冲破敌人的舆论封锁,动员国内外舆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其编造的种种谣言,申明我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坚定立场,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蒋介石的反共宣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教育了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们,使蒋介石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在国内舆论的宣传方面,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全面、系统、深刻地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无情鞭挞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随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发起了凌厉的宣传攻势。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在解放区,通过报告会和大会声讨等形式,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揭露和谴责。在国统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还指示南方局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散发。

为使国外人士了解事变真相,争取国际舆论对我党的同情和支持,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对国际社会的宣传。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世界各方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勉危局<sup>[7]</sup>。在重庆,周恩来利用国民党陪都的有利条件,组织力量准备了大量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

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族统一战线终于得以维护。

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还先后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他们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和声援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指责国民党当局。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黄炎培说,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孺妇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全国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各民主党派对蒋介石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表示愤慨。海外侨胞纷纷谴责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呼吁政府停止内争。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相继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警告:国民党如再进攻中共军队,挑起内战,苏联将停止对华援助。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当着蒋介石的面批评其对内政策,同时,美国政府通知蒋介石:“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sup>[8]</sup>。英国表示暂缓开通滇缅公路,以此作为对蒋介石的惩戒。

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和苏美英三国的外交、经济压力下,蒋介石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深感“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sup>[9]</sup>。由此,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明目张胆的反共活动,继续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共同抗击日军的侵略,抗日民

## 五、结 语

中国共产党从容应对皖南事变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事实,表现出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不但没有达到摧毁共产党的目的,反而使更多的人看清中国共产党确实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私利的,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使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这就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为提高,更证明它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70.
- [3]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中央档案室.皖南事变(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皖南事变资料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47.
- [6]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7] 廖承志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5.
- [8] 陈枫.皖南事变始末[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201.
-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70.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South Anhui Incident and the Capabilit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Handle Emergencies

WANG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South Anhui Incident is an emergency rocking the whole world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when Chinese nationality is at a critical life-and-death moment. How to deal with the emergency is crucial for either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because it might lead to internal conflicts or solidarity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At the critical mo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righ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emergency, finally solved the crisis of the outbreak of large-scale civil war, and defeated the second attack by Kuomintang against CCP. The excellent abi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deal with South Anhui Incident indicated its the political maturity.

**Key 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e South Anhui Incident; emergenc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pability